

蒙古及蒙古人

第二卷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 著

张梦玲 郑德林 刘汉明 译
卢 龙 孟 苏 荣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呼和浩特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ЕЗДКИ В
МОНГОЛИЮ В 1892—1893 ГГ.
А. ПОЗДНЕЕВЫМ.

ТОМ II

дневник и маршрут 1893 года.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 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98.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

汉译本序言

早年，我开始从事蒙古史研究的时候，曾阅读过日文版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日文版的第二卷书名为《东部蒙古》）。读后，深感该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对研究当时蒙古地区的史地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研究当时我国的蒙古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更是一部难得的参考资料。

前几年，由于撰写书稿的需要，我又查阅了由日文版译成汉文的《蒙古及蒙古人》的第一卷，以及该书俄文原版的第二卷，颇感我们对这部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遗憾的是，第一卷译本很不理想，错漏较多，而第二卷还无人译过。

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外文资料也不断地被译成汉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外语系刘汉明等同志翻译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的第二卷，也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十分可喜的。今受出版社和译者的嘱托，在此书出版之际，为之写上一点文字，以表我对这一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沙皇俄国早从十七世纪就开始了对我国的考察和研

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后,俄国的“旅行家”、“考察队”更是蜂拥而来。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竟有三四十支有案可查的俄国考察队,来到我国当时的蒙古和青海、新疆、西藏等地,进行有目的的考察。其中1876年,1889年和1899年,每年竟有四五支俄国考察队同时在这些地区活动。如果把他们所走过的路线绘在一张地图上,简直密如蛛网,几无插笔之地。其中主要旅行家就有:彼·彼·谢苗诺夫、格·尼·波塔宁、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米·瓦·彼夫佐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彼·库·科兹洛夫、弗·伊·罗鲍罗夫斯基、弗·阿·奥勃鲁切夫、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兄弟、德·亚·克列缅茨,等等。这些人都曾多次来到我国长城以北和甘肃、四川以西地区,波塔宁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竟来过五次之多。他们来“考察”时,有的拉帮结伙,荷枪实弹;有的携妻带口,走门串户;有的乔装打扮,重金收买。总之,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我国各方面的情报和资料,然后写成各种专著和文章,有的著作竟达千页之多。在科兹洛夫所写的《蒙古与喀木》一书的附录中,列举了他从1895—1941年所发表的六十余部著作和文章的目录。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写的《蒙古和唐古特地方》一书的附录中,列举了他所写的一百一十多部著作和文章的目录。据奥勃鲁切夫统

计，波塔宁一人就发表了二百三十五部专著和文章。他在注释自己的材料时，引用了三十三种方言来作比较。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出面，但实际上是由外交部、陆军总参谋部和沙皇本人支持的。他们完全是根据沙皇俄国侵略的需要，而进行资料搜集工作的。这些资料，我国大部分尚未翻译。

1892年，俄国外交部奉沙皇之命，又一次派遣人员，前往我国蒙古地区调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并同时研究俄国对中国的贸易关系。这次受外交部派遣的是一位蒙古学学者，即阿·马·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

波兹德涅耶夫出生在奥廖尔省一个世袭贵族的家庭，从童年起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于1872年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1876年毕业后，随即受教育部的派遣，加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装备的蒙古考察队，前往蒙古进行考察。波兹德涅耶夫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整整住了三年，专学蒙语。他返回俄国时，带回手抄本和印刷的蒙文文献一百五十七部，共九百七十二册。回国后，他被派到彼得堡大学为获得教授学衔进行准备，并于1881年通过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因而获得了蒙古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又获得蒙古文学额内副教授的职称。1883年，他提交了以《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附解释，其中包括1636—1736年的喀尔喀史料）为题的博士论文，因此被授予蒙

古文学博士学位。1884年又获得蒙古文学额外教授职称。1886年晋为额内教授。他从1888年起担任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秘书。1889年他除讲授蒙古语文课外,还受聘教授满语,直到1892年被选派赴蒙古考察。

1892年6月—1893年10月,波兹德涅耶夫来我国蒙古地区考察,历时十五个月,行程二万二千俄里。这次旅行考察由他的妻子伴随,并协助他搜集资料等。他们把这次搜集的资料整理为七卷,因出版困难等原因,只出版了两卷日记,名为《蒙古及蒙古人》。该书第一卷记述他1892年6月—12月在外蒙古的旅行考察活动。他先由恰克图进入蒙古,对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以及它们之间的道路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哲布尊丹巴的身世专门写了一章。最后写由库伦经张家口到北京一线的情况,并对张家口专门写了一章。第二卷记述他1893年3月—10月在内蒙古的旅行考察活动。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译本。1983年初,波兹德涅耶夫在北京调查了京师同文馆和俄国东正教堂,写成了该书的前言部分。接着由北京出发,再经张家口来到归化城(呼和浩特),沿途所经地区均做了详细记述。特别是作者对归化城和土默特颇感兴趣,写了十余万字。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外国人记述这一地区最为详细的材料。他从归化城返回时,又特地到多伦、上都故城、承德、应昌故镇、克什克腾旗、巴林旗、乌珠穆沁旗查访、考

察，然后渡克鲁伦河到库伦，返回俄国。作者对沿途各寺院、庙宇及喇嘛状况调查得十分详细，并引用了一定的蒙、满文资料，对其所见到的重要碑文石刻也均有记载。他于1893年10月回国时，还带回汉、蒙、满文的手抄本和刊印本文献资料一百三十八部，共七百二十七册。

根据彼得堡大学校刊介绍，波兹德涅耶夫在本书出版之前，共发表了各种著作和论文六十八部。由于他精通蒙古族口语和书面语，并在蒙古逗留了三年，回国后又讲授蒙古文学、历史十余年，这样就使他对蒙古历史和文学具有渊博的知识，所以他的第二次蒙古考察所写的资料性日记，就比较充实和具有学术价值。它是研究当时我国蒙古地区近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作者站在沙皇的立场上，必然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中俄关系上的某些问题持沙俄的观点，因此，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对蒙、汉民族歧视的情绪，有意识无意地进行一些民族挑拨和诽谤。这些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批判的。由于作者受汉语水平所限，在引文、注音、注字、年代计算等方面都有错误的地方，虽经译者发现的都加以改正和注释，但仍难免有遗漏之处，望引用者注意核对有关中文史料。

据我所知，本书是由华北地区中俄关系研究会推荐翻译出版的，并列为研究会译丛之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内蒙

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蒙古师大历史系和内蒙佛协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由于该书疑点、难点较多，他们曾多方请教，查阅了大量中外文资料，参照了日文版本，并对旅行路线上的一些重要地段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核实，译文又经过多次修改。因此，可以说译者是下了一定功夫，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在该书出版之际，让我再一次表示祝贺，并望今后能更多地出版一些这方面的图书和资料。

特 布 信

1982年11月27日

第 二 卷

前 言

一本书里，尤其是一本篇幅大的书里，作者在一开头总是要写篇前言，用以叙述作品产生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和想法。在第一卷^①的前言里，对本书的有关情况及结构和概要，都已作了说明，看来我这次本可不必再写任何前言了。但是不然，因为在第一、二卷我的日记中，从1892年12月21日到1893年2月18日有将近两个月的中断，而我又不愿使读者对我在这两个月里所做的事情毫无所知。

这段时间我是在北京度过的，其间包括为期两周的旅行：从北京到天津，并沿着中国铁路继而到达塘沽站，又从塘沽站十分方便地到大沽看了看那里的设防情况。总的说来，这两个月我用来对中国进行了了解。由于中国并不是我专门研究的对象，我就

^① 指作者于1892年在外蒙古旅行所写的日记。——译者

没有把有关它的情况写进本书。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生活是那样地独特，对任何一个欧洲人来说是这样地新奇、怪异，而俄国书籍中对它的记载又是那样地少，以至于在北京哪怕只住上一个月，就可以把所见所闻写出整整一部书来。我这次在北京的逗留已不是第一次了，因此在记述这座城市奇特的风貌和生活时就容易得多；但是我不能不说，当时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欧洲人对中国的影响究竟如何，中国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些影响。为此，我总是尽量首先了解欧洲传教士的生活及他们对中国人的影响，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些传教士毕竟是欧洲文化在中国最主要的传播者。此外，传教士问题对我来说之所以重要，还由于我要收集有关最近于1892年发生在蒙古的一起教案的较为完整的材料，并探求中国历次反基督教暴乱的根由。清朝政府为讲授欧洲科学而设立的若干所学馆，在传播欧洲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远远不能和传教士相比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所学馆设在北京，名为同文馆，我对它也进行了研究。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能有时间把我关于中国的记述全部发表出来，不过，当我把所收集的有关中国人对待基督教及欧洲传教士的态度的一些材料写进本卷（见原书第256—273页）之后，我还想把关于同文馆的一些研究材料在这里介绍一下，这特别是因为在俄国文献中关于这一机构看来连一个字也未曾提到。

1860年的中英战争和随之而开始加强的欧洲列强与中国的交往，逐渐使得整个中国政府，至少是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官员们，认识到中国人研究欧洲语言和学习欧洲各种知识的必要性。

总理衙门^①这个专门与欧洲列强打交道的政府机构设立之后，中国人处处感到，无论是为正确理解欧洲人的要求，还是为对这些要求作出恰当的答复，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翻译人员。基于这一认识，于次年——1861年开办了总理衙门附设的学馆，或更确切地说，三所分别学习英、法、俄语的学馆。

下面是恭亲王（当时的总署大臣）和他在总理衙门的几个同僚呈给清帝的会奏摘录，它能使我们对此一学馆产生的经过更加清楚。

“查咸丰十年，”奏折中说，“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飭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以任选自八旗中之少年所学外国语言文字之教习。”

11

“臣等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广东回禀无人可派，江苏巡抚则称，彼处倘若有此人选，则自亦急欲用之，是以日久未能举办。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故此不必再于广东、上海寻求，而须径由外国延访教习。

“旋据英国威妥玛言及该国包尔腾堪充英语教习之席。俄、法等国语言文字，亦应一体学习，容俟觅有妥人教授，再行随时

① 总理衙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又称“总署”，是清政府于1861年初（咸丰十年底）设立的主管外交事务的部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外务部。——译者

酌办。”^①

由于这一奏折得到了皇帝的批准，1862年6月就开办了英文馆，而法文、俄文馆也于1863年春相继开设。

当时这些新设各馆的组织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聘请到各馆来的教习都是经欧洲各国大使馆推荐的当时居住在北京的欧洲人，其中大部分是在那些大使馆供职的人员。各馆的学生都是从满族人、并且是京师特权的军界招收来的；他们只须在二十岁以下，即使尚未获得功名也无妨他们入馆学习。学生在就学期间都在家住宿，每月仅从政府方面领取三两白银（合六个银卢布）的膏火费^②。学馆的最高领导是两位校长——“提调”（总署司员的职务）。馆内全部经费都属国库开支，由总理衙门

^① 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摺》的有关段落与波氏的俄译文在词句上略有出入，现将奏折原文摘抄如下：

“……窃查咸丰十年冬间，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飭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

“臣等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习，并行文八旗，挑选学生去后，嗣据各该旗陆续将学生送齐，而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鉅，未便飭令前来，是以日久未能举办。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旋据英国威妥玛言及该国包尔腾兼通汉文，暂可令充此席。……

“再，俄、法等国语言文字，亦应一体学习，容俟觅有妥人教授，再行随时酌办，合并陈明。谨奏。”（见《洋务运动》，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册，第7页。）——译者

^② “膏火费”，旧时书院、学校中给学生的津贴。——译者

支付，馆内经费和财产的所有帐目也均由总署掌管。该馆最初的俄文教习是我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首席翻译A·Φ·波波夫^①；最早的英文教习是J·S·包尔腾牧师；最早的法文教习是司默灵神父。

这些学馆主要是根据中国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官员们的倡议而设立的，可是它们却不能达到这些组织者的期望。充满热情的改革者们盼望的是迅速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事情却总在按着自己惯常的、缓慢的步伐进展。在寻求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官员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其中当然不无欧洲人的看法），认为学生成绩不佳是由于他们普遍缺乏学识，因此，学馆必须进行改革，以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决定在不取消原有学馆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一些革新，以达到上述目的。

这样，总理衙门于1866年末，在原有的几馆之外，又增设了一所进行普通教育的学馆^②。它除了教授欧洲的几种语言外，还须教授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国际法和医学。这所新馆的办学原则比前几所学馆有所不同：第一，新学馆的教习是总理衙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从欧洲聘请来的；第二，学生不分满人、汉人，都可入馆，但必须是科举出身，因此在新馆就学者，有的已超过了三十岁，甚至四十岁；第三，这些学员，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都必须住在馆内，每人每月可领取膏火费十两银子。新馆校长仍由旧馆的那两位校长（提调）兼¹³任，但此外又增设了两名新学监，这两位学监须和学生一同在馆

① 中国名字为柏林。——译者

② 当时称“科学馆”。——译者

内住宿。不过，时隔不久，总理衙门把原来几馆的学生也交给这两位学监管理了。而新旧学馆的名誉督学则由总署的一位官员——以将世界地理译成汉文而著名的徐继畲担任。

这样安排的结果使这些学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在行政方面新旧学馆是统一的：它们有共同的最高领导——恭亲王，有共同的督学，有共同的校长和学监；可是其次，在教学方面它们却又是分离的，因为在旧馆仍保留着原有的教习，而新馆却来了四位由赫德聘请的所谓教授。其中两位很快就开始了同旧馆一样的初级英文和法文的教学；而另外两位只是在学馆里注了册，领取薪俸，却不能讲授自己的专业课程，因为他们不通汉语，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可以用英语和法语听课的程度。在经济方面，新旧学馆在支付给学生的费用和支付给中国教习的薪俸等方面也是统一的，但在洋教习的待遇方面却产生了差异：由中国人自己聘请的原有教习是从一位校长那里领取总理衙门拨下的薪金，而新来的教授们却是直接从赫德那里领取薪金，而且数额要比原有教习们的薪金多。这里应当指出，从这时起，各馆的一切费用都是同一个来源，即从各欧洲商船所征收的船钞。当时的海关、各港口的灯塔，以及后来中国驻欧洲各国使馆的费用，也均由此船钞开支。由于新教习是由赫德请来的，而且他们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条件也正是与他订立的，他们自然就只承认赫德的管辖；他们又不懂汉语，所以只有通过赫德才能与中国人打交道、办理事务。而原有的教习们则恰恰相反，他们不无理由地认为，只有总理衙门才是自己的上级，他们几乎就没把赫德放在眼里。可是赫德由于新聘请来的教授们与他有上述关系，他在学馆事务

中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上述各种矛盾的直接后果是，无论是学馆还是学生的地位，以至教授和教员本身的地位，都极不明确。原有的英文、法文馆¹⁴的教习讲授着原来的课程，在教学上付出的是同样的劳动，可是却拿着最低的报酬；而由赫德请来的他们的同胞们讲授的也是基础课程，得到的薪金却要比他们多三倍，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受屈。学馆里充满了明争暗斗和不满，最后终于在1868年初，导致新旧学馆教习地位，继而是学馆本身的一些重大变革。在此以前，英文和法文馆的原有教习已拒绝授课，他们的课由那些已在新学馆任教的教授们承担。在这次变革中总理衙门决定：第一，把原有的英文教习马丁^①先生调进新馆任课堂翻译，并使其职位及薪金与新馆教习相同；第二，将旧馆的两名学生调入新馆，为不大懂汉语的教授们当助手，但他们听课却仍在旧馆。这样一来，到1868年初，原有的学馆中，英文、法文两馆在教务方面也与新馆统一了起来，只有俄文馆的情况特殊：它在新馆没有相应的班级，因此中国人对它只有在一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就是把俄语教习的薪金提到与赫德聘请的教授的薪金一样。

我们可以把上述事件归为这所所谓天文馆^②的历史的第一阶段。对这所学馆，人们曾寄予多么美妙的希望！可是取得的结果，看来却令人十分沮丧，至少在最初几年是这样。但它又怎能

① 中国名字为丁韪良。——译者

② 作者在这里及以后几处提到的学馆名称“天文馆”，实际指的是设有天文、算学等课程的新馆——天算馆。——译者

不是这样呢？赫德先生和满清官员们本该物色通晓汉语的洋教习，或是责成从西洋聘请来的新教习们学会用汉语授课，可是他们却要学生们去学会用外语听课。结果是，年纪已经不轻的（这在前面已提到过）学生大部分要么是干脆退学，要么就只是在每月领膏火费的时候才去听一次课；其余的学生在这两年期间也几乎是一无所获。对新馆一直不满意的总理衙门于次年——1869年终于要想完全撤销这所学馆了。幸好这个学馆里荐来了一位姓李的
15 中国人。这位中国人通晓数学理论，并曾在新教传教士的指导下把好几部欧洲书籍译成汉语。总理衙门派他在馆里讲授数学，并同时决定从天文馆招收的一批老学中留下六人、从旧馆中抽出四名学生，又新招收三名比较通晓英语的上海人为新馆学员；然后把天文馆的法文、英文课都停止，让这两门外文的教学在旧馆和俄文教习一样讲授自己的课程。总署大臣们从俄文教学中毕竟还是看到了一点效益，因为俄文馆的学生尚能经常为总理衙门翻译一些从边境寄来的俄文文件。从这一变革中不难看出，这时的天文馆几乎已是名存实亡，因为各门学科的教授，除了一名教算术的中国人之外，在馆里几乎都不上课，而外文教习又都被调到旧馆去了。

应当说明，在1868年末和1869年初这段时间里，总理衙门对学馆问题异常焦虑，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总署各大臣重视这些学馆的科学价值，恐怕倒不如说是由于大臣倭仁对这些学馆，尤其是对他们开设的天文馆，进行了攻击。他甚至还上折请求撤销新旧学馆，因而总理衙门不得不为这些学馆进行辩护。彻底取消新馆，或是听任它停留在当前这种可悲的状况中，对总署大臣们

来说看来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不仅在外国人面前不好看——在外国人看来这所学馆的存在似乎就是中国政府渴求进步的证明——而且主要的是，这将是倭仁和反对总理衙门的那帮顽固保守的中国人的胜利。此外，赫德先生由于参与学馆事务，也招来了许多不快：一方面，新教习们不时提出种种要求，使他不胜其烦；另一方面，满清政府的官员们又对他请来的教习本身和学生的低劣成绩不满。因此赫德总想找机会摆脱这些累赘。1869年年中，前英语教习马丁博士的返回北京恰好为他提供了这一机会。前面已经说过，马丁博士是在1868年的改革后留在学馆担任课堂翻译的，可是他无事可做，就回他的祖国——美国住了一段时期。马丁精通汉语；在旧馆教授了将近四年英文；他还曾将《万国律例》和《物理》译成汉文，在中国人面前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因而他的译著由总理衙门出资刊行。经他本人、满清官员和赫德三方商议确定，总理衙门任命他为总教习，也就是旧英、法、俄三馆的监督，还委派他一面在天文馆担任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及其他课程的教学，一面负责整顿这所已奄奄一息的学馆。此外还打算设立一个专门培训翻译人员的专业。总理衙门的一名官员董恂在这过程中就曾对马丁说过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清廷宦臣深望于当今学员之中，不乏自己后继之人。” 16

在马丁的管理下，几所学馆可以说都重新进行了改组，尽管它们的新体制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各个学馆经过不到两年的期间，毕竟有了相当大的起色，并于1871年初出现了如下的局面：

新旧两馆，以及两馆的教习，互相之间都完全平等，并且开